

书评

《雪兰莪吉胆岛五条港村之渔村产业与社会文化变迁》

Fishing Village Industry and Social Cultural Changes: A Case Study of Sungai Lima Village, Selangor

李建明，《雪兰莪吉胆岛五条港村之渔村产业与社会文化变迁》，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ISBN: 978-983-3527-73-1

陈琮渊*

(CHEN Tsung-Yuan)

本书是作者在其硕士论文（李建明，2012）基础上出版而成的学术著作，也是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方志系列丛书”的最新力作，该系列在廖文辉教授等人的推动下，已出版多部取材新颖，质量俱佳的地方社会史论著及史料汇编，见证了本土新生代研究者的崛起及大马地方志书写风气的方兴未艾（陈琮渊，2015）。本书的研究对象五条港因其极具特色的聚落景观、民间信仰及节庆活动，近期吸引不少研究者前来调查，完成多部研究报告及硕士论文（王梅霞，2009；许湘彩，2010；李建明，2012；林芳仔，2012；陆赏铭，2015）。李建明当属其中着力最深的一位，研究成果受到好评。（安焕然，2015）

五条港坐落于雪兰莪州巴生外海吉胆岛东北部，为一个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人渔村，当地居民以祖籍同安的闽籍华侨华人为众，居住环境受海水及红树林围绕而自成一格。五条港地处生物多元、植被多样且盛产鱼、虾、蟹、贝等渔获的潮间带区域，一度成为大马虾米的主要产地，对外交通则仰赖水路，现代化进程深受邻近的吉胆岛、巴生县影响。在1990年代以前，五条港时常被国家发展计划所遗漏，但也因此幸运地保留了许多“原汁原味”的华人传统风俗及原生态自然风光。五条港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以产制虾米、海蜇皮（水母）为主的“七星渔业”，村民的生活作息也随潮而动，也就是“大流”（农历每月廿七到隔月初四、十一日至十八日）出海作业；“死流”（农历每月初四至十一日、十八至廿七日）准备出海的日常节奏，当地最重要的节庆是大年初九天公生，以及主要神庙的庆典活动，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信仰文化。

* 陈琮渊博士 中国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主任。电邮地址：kurtchen1979@yahoo.com.tw

日据时期，不少马来半岛之金门、永春、厦门、海南等各属方言群人士避居吉胆岛及五条港，加上近年来移入的印尼渔工；印尼、中国、越南等国外籍配偶，丰富了五条港的人口组成。本书详实记录了各族群来到五条港后所产生的变与不变，其中又以宗教信仰及语言使用保存最多原貌，也成为凝聚地方认同的主要力量。正是在“以海为生，靠天吃饭”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宗教信仰成为五条港村民重要的心灵寄托，全村计有旌阳宫、振龙宫等18间庙宇，活络的方言群及宗族网络撑起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拿督公信仰更体现了五条港居民追求天、地（海）、人和谐共存的世界观与社群观。用作者的话来说，“建立起当地的神明信仰以保护地方安全，对于此种关系的确立是仍对于环境的陌生及恐惧感之下而产生。拿督公…信仰文化引领马来西亚不同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经济上、生活上、或宗教上取得和谐。”（页33）

1960年代的一场大火，烧毁五条港的主要街区，暴露了当地交通建设长期缺乏政府支持，村内道路率由民宅外部的木造高脚“路桥”延伸串接而成的事实，这些路桥将五条港“北区”、“中区”、“南区”、“港内”四大区块的村民居住空间紧密连结在一起，构造出独特的聚落地景。

1970-80年代，“七星渔业”发展到达顶峰时，五条港人口一度达3000多人，从事七星渔业的船只计有220-250艘，不少发家致富的村民开始到雪兰莪州人口最多的巴生县置产，人口外移的情况也日益明显，并直接反映在家庭结构的转变上，从第一代以核心家庭为主，经过第二代多为直系家庭、第三代朝向主干家庭的发展变化，第四代五条港人正面适婚青年找不到伴侣的现象，旅居外埠、两地往来的核心家庭成为重要的生活形态。据作者2012年的估算，五条港约有206户家庭，797位居民。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条港村民，李建明对家乡自有一份浓厚的情怀，有感于人口外流、环境破坏导致渔业没落（工厂违法排放废水、海洋油渍污染、海漂垃圾及生活废弃物的处置不当、大型拖网渔船的滥捕）等问题，认为有必要结合宏观与微观层次进行对比分析。作者通过地利人和之便，研究岛上三代居民所面临渔村社会变迁及发展问题，尝试“透过深入田野调查以期撰写五条港的环境与移民社会结构的演变，包括当地民间信仰的活络、传统产业的发展、聚落空间的形成与改造等……现代化的介入对居民产生那些改变，包括五条港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相关单位又为地方带来那些发展。最后，探讨五条港在产业转型下的社会与文化变化，包括单一族群广大至多种族社会、渔业的发展与聚落空间的变迁、以及近代渔业没落与产业的转型。在产业转型之下，五条港居民的自我意识型态上又如何表述自己的看法”（页3-4）。作者从访谈中得知，不少五条港居民多抱持“过一天算一天…吃到那时看到那时，水淹到鼻子，要淹到死了才来忙”（页101）的心态，保守观念一时之间难以改变，加之政府计划推动时冷时热不受信赖，发展因而停滞不前。

近三十年来，五条港陆续迎来多项由政府及商业资本推动的大型发展计划：如1992年的高尔夫球场开发、2004年的养猪计划，以及十年前雪兰莪州政府的“环保村计划”等，但多半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疾而终。书中并未对这些发展方案的成败做出太多评述，而更关注当地民众的应对态度及根深蒂固的生活观念问题。李建明特别指出，五条港拥有发展生态观光的优越条件，有望结合近来成功转型的养殖渔业打造国际级的观光旅游配套行程，过去几年五条港也先后开设多间民宿招徕国内外游客，但

总体而言，当地旅游发展深受交通条件及垃圾问题而难有重大突破，村内民宿的经营管理及对外宣传也仍待推广普及。

本文认为，书中对于五条港发展的“局内人”忧心及具体分析，其实可以取法“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问题意识，从而进行更深刻的解读。例如本书所引述的人类学者James Scott，在另一本著作中已然指出：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劣而自相矛盾的，经常忽略真实生活中的社会秩序情况，政府的政策规划者对于其所要“发展”的社区结构及其生态环境所知甚少，只是用所谓“清晰而简单的理性设计”来强力推动执行，结果多以失败告终，甚至带来可怕的灾难。同样透过个案比较分析来回答社会发展是否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的问题，社会学家Peter Evans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零和赛局，公民社会的发展目标也可以透过国家机器的协力来达成。在实践方面，必须掌握好历史及社会脉络，才能进一步发挥国家机关及公民社会互补所产生的综效。两者的互补性乃是基于公（权威）私（效率）部门的差异与分化，看似矛盾，分则相克，合则相成，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概念，而好的发展仰赖国家与社会彼此镶嵌与互补，当中社会资本（人及人际网络的角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资源（区位）要素。本文相信，上述观点能为关心五条港发展的读者们带来启发及反思。

有鉴于官方统计及档案缺乏，本书翔实地调查与记录五条港发展所得之民间史料更显可贵，作者一方面就产业发展、民间信仰、社区生活、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详细梳理，呈现在地居民的关怀与观点；也能适时跳脱，从一位外乡归来的研究者立场剖析发展的全局样貌。书中对于电力、照明、储水设备、渔船动力等物质文明的引进有精彩介绍，特别是搭配口述历史说明上述器物的庶民使用脉络，呈现引人入胜的社会生活场景，弥补了文献记录之不足。

本书亦有若干瑕不掩瑜之处，主要的问题包括：首先，章节之间的逻辑结构及行文布置并不紧密，第一章及第二章的小节组成并不对称，不利于进行不同时期的比较参照，且予人跳脱迂回之感。其次，文献回顾与全书讨论的内部关联并不直接，例如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回顾，实际上除了李亦园院士的著作外，回顾及借鉴的主要是大马新村研究文献，参照意义大于对话作用；岛屿及聚落发展的文献几乎只引用台湾出版的硕士论文，说服力明显不足，且台湾与马来西亚国情不同，自然村与新村能否一概而论（作者的结论亦提及其研究与新村进行比较研究的企图），便值得商榷。文献综述若不能为全书的论述提供较好的理论或个案支撑，删除或许是更合适的作法。第三，在方法论方面，作者应陈明以“在地人”身份所进行的访谈及参与观察之优势与限制何在，同时也可使用焦点团体访谈方式以取得更全面的资料；书中多次引述当地村长、华校校长等所提供的重要资料及说法，应在行文中对其简历及任职时期作必要说明；而书中引述访谈资料时，亦应标明访谈编码，并在匿名保护处理下，制作简介介绍受访者情况，以增加资料可信度并使读者更容易掌握相关脉络。此外，结论部分最后得出复杂的变迁图示（页188，图4-1-1），亦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归纳追求简约的理论抽象目标。第四，本书正确地指出影响五条港社会变迁的最主要因素，系来自内部的经济变化及外部的政治力量介入，因此全书后半部很大程度是在处理政府的角色及治理问题，但书中既未讨论五条港的具体领导权结构（对于地方政治人物作为及选举政治的影响，以及社团及神庙组织的角色的讨论未见具体展开），而处理

1990年代以来的五条港发展也多半引述媒体报导未进行深入分析，使得政府政策及发展问题的讨论流于平面，殊为可惜。最后，本书编辑过程可能直接使用文书作业系统中的“繁转简”功能，而未经过仔细的校对，出现不少跳脱文脉的词语，如“数据”（资料）、“数据源”（资料来源）、“小区”（社区）等，书中也有若干错别字及语意不清的表述，本文大致罗列于后以供作者再版时更正参考。

由于环境及资料条件有别，地方史志很难采取统一的口径作为判准，从而区分绝对的好坏，其书写的意义在于保存（甚至于抢救）地方发展的史料并进行初步诠释，以为此后更为全面的历史论述、社会分析及个案比较研究建立基础。就此而言，本书所做出的具体贡献，并不因为上述微瑕而减损。

勘误建议

James C. “Scoll”（页11，应为Scott）

90年代以后五条港并不是“自家营业”（页14，应为“自力更生”）

所以本研究的对象分成三个“阶级”（页15，应为“世代”）

近而对它们有畏惧（页33，应为“进而”）

仅有在小学前方的草场上“拖”裤排泄而已（页61，应为“脱”）

这主要是拿督陈祖排的功“臣”（页105，应为“劳”）

他们对五条港又带来那里影响（页125，应为“那些”）

电厂的运“做”（页126，应为“作”）

由引“击”所发动的机器（页143，应为“引擎”）

参考文献

安焕然，〈大马华人的民俗研究〉，《星洲日报》，<http://www.sinchew.com.my/node/260258>，2015年10月18日。

陈琮渊，2015，〈浮现中的地方认同：探索马来西亚华人地方史志书写〉，《南方大学学报》，第3期，页127-131。

Evans, Peter. 1996. “Government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 *World Development*, 24 (6): 1,119-1,132.

李建明，2012，〈海外华人渔村产业与社会文化变迁：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吉胆岛五条港村为例〉，金门：国立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林芳仔，2012，〈地方信仰与社会：以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为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硕士论文。

陆赏铭，2015，〈马来西亚五条港华人渔村宗教文化研究〉，《环球人文地理》，第14期：页176-177。

王梅霞，2009，〈小地方、大历史：从马来西亚五条港看社会记忆与历史建构期末成果报告书〉，“人文领域人才培育国际交流计划（海外专题研究）”，台北：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纲计划。

许湘彩，2010，〈五条港高脚渔村的聚落建构与空间形塑：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的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硕士论文。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著、王晓毅译，2017，《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